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价值评价与 客源市场分析及其开发策略

徐小琴 汪本学¹

(衢州学院商学院, 中国浙江衢州 324000)

【摘要】: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文章依据浙江各地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及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和历史演进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分为 9 大农业文化遗产区。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美学、生态学等多重价值, 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应该注意对其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和间接衍生价值的区别对待。文章构建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体系并定量评价了浙江省内 8 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运用增长极理论重点研究了浙江省内 8 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供给增长极、旅游需求增长极、旅游客源市场潜力和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效用等, 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策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农业文化遗产 旅游需求 增长极理论 客源市场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1) 06-0232-09

自原农业部 2012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开展发掘、认定、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 截至 2019 年底已经公布了 4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共计 91 项, 其中浙江省有 8 项。联合国粮农组织自 2002 年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以来, 经联合国专家认定, 我国共有 15 项农业文化遗产被选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在数量上和种类覆盖度上均居世界各国首位。其中浙江省有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湖州桑基鱼塘系统 3 项, 占全国的 20%, 充分表明了浙江省农业文化对全国的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 国外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侧重于保护、调查、考察等研究, 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不太重视, 以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为主, 遗产开发应用研究较少, 从休闲和科考等角度有少量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开发方面的研究^[1-2]。而国内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从概念分类到保护传承及开发利用^[3-10], 更多的研究是将农业文化遗产应用到乡村旅游发展实践中^[11-13]。

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有从遗产调查梳理摸清家底^[14]到遗产旅游开发评价、应用^[15-17], 许多学者还从农业遗产保护、开发模式、旅游开发路径进行了探讨^[19-21], 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将农业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旅游资源相结合, 运用增长极理论来研究各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价值差异而表现出旅游增长极—旅游腹地系统的研究范式目前还少有成果。

本文将利用增长极理论从旅游供给增长极和旅游需求增长极角度对浙江省 8 项重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潜力进行研究。通过对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的客观评价以及对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的客源市场进行定量分析, 进而为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探索有效的路径选择, 创建现代农业和多产业、多业态结合的发展模式, 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¹**作者简介:** 徐小琴 (1981-), 女, 浙江衢州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E-mail: xu2780179@163.com
汪本学 (1969-), 男, 湖北恩施人,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农业文化。E-mail: 2991927156@qq.com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20NDJC177YB);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71YJA850009)

略，推进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开辟有效途径。

1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简介

浙江纬度位置适中，全年温湿光照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上山文化遗址”表明早在一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栖息耕作。但是，浙江地域面积较小，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1%左右，而常住人口 5737 万人，占我国人口约 4%。浙江虽然不属于典型的山区，但是山地和丘陵面积占 70.4%，平原和盆地占 23.2%，河流和湖泊占 6.4%，耕地面积仅 208.17 万 hm^2 ，故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

这种不太有利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虽然增加了生存的压力，却也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精细化，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王思明等从农业对象、农业技术、农业制度和农业环境四个方面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内容界定和分类^[5]，在此基础上，汪本学等通过全面深入调查，梳理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依据遗址类、工程类、景观类、聚落类、工具类、技术类、文献类、物种类、特产类、民俗类 10 个大类对浙江省 276 项农业文化遗产并进行了归类^[14]，为后期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重点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 8 项农业文化遗产。该 8 项农业文化遗产都有其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匹配现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促进，既保留有农业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又具有在当今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可持续性。

2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区划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色，遍布全省各地，并且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与自然地理条件、农业生产特色相吻合，沿海地带的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区域的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海洋性。总体来看，浙江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受地貌、区位、社会、经济等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深刻，而纬度等地带性因素的影响较小。

根据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及浙江省地形、海拔、气候、农业发展演化历史、现状农业生产特征，将全省分为 9 个农业文化遗产区（图 1），界线附近的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具有逐渐过渡性。

(1) 浙北杭嘉湖平原区，这里地势低洼、土壤肥沃，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是传统的水稻、淡水鱼及水产、桑蚕种养殖区，有种类最多、数量最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良渚文化遗址反映了这里早在 5000 年前就有了农业水利灌溉工程和籼稻、粳稻、葫芦、花生等众多的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

(2) 宁绍北部平原区，这里地势低平，为沿海淤积平原，现在是浙江省滩涂面积最大的地区，农业历史悠久，河姆渡遗址表征这里有着 7000 多年的农耕历史，至今是浙江省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农业文化遗产丰富多样。

(3) 金衢盆地农业文化遗产区，从义乌、东阳一直向西延伸到常山、江山，呈狭长型河谷盆地，衢江、东阳江等蜿蜒流淌其中，人口较密集，农业历史悠久，交通方便，并且自古是杭嘉湖平原区和荆楚地区交通的重要通道，留下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引水灌溉农业历史悠久，农业生产种类丰富多样，物种物产资源丰富，既有水稻、莲藕等洼地平原物产，又有甘薯、柑橘等丘陵、山地物产。

(4) 浙东盆地低山区，主要包括绍兴、宁波、金华、台州的部分低山丘陵盆地，农业文化遗产种类较丰富。

(5) 浙北中山丘陵区，包括湖州西部天目山区和富阳、临安等低山丘陵区，这里受杭嘉湖平原农业文化的影响较大，人口多从平原地区迁移来，近代受城市文明的影响很大，农业文化遗产过渡性较强。

(6)浙西中山丘陵区,是杭嘉湖平原、金衢盆地和徽州文化区的过渡地区,包括开化、建德、淳安、临安西部,衢州北部山区,徽派文化的影响底子深厚,后期受杭嘉湖平原吴越文化的影响较大,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浙西农业文化遗产区。

(7)北部沿海丘陵平原区,包括北起舟山群岛至宁波北仑—奉化向南至三门湾北岸沿海狭长的平原及丘陵区,海洋渔业发达,吴越文化海洋化特色明显。

(8)南部沿海丘陵平原区,三门湾往南直达浙江最南端沿海狭长的平原及丘陵区,西面靠山东朝大海,气候条件较优越(古时候台风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损失力小),人口稠密,农业历史悠久,海洋渔业文化繁荣,闽文化烙印深刻。

(9)浙南中山区,是浙江省山地最密集、海拔最高的地区,也是浙江省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人口多为后期从平原地区迁移来,农业生产历史相对较短,梯田、山货、经济林果、经济作物等为主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

本文重点研究的 8 项农业文化遗产在此农业文化遗产区划体系中,其中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属于浙北杭嘉湖平原农业文化遗产区,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属于浙东盆地低山农业文化遗产区,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属于浙南中山农业文化遗产区,仙居杨梅栽培系统属于浙东盆地低山农业文化遗产区向浙南中山农业文化遗产区的过渡地带。

3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评估

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种类丰富、数量巨大,具有多层次的价值蕴含和多样化的经济品质,其旅游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农业文化遗产本身具有多方位、多层次的价值,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现在农业生产、社会、经济、文化、物种基因、生态、美学、休闲娱乐、学习研究、陶冶情操等众多角度,根据陈耀华等的研究^[26]。

可以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10 大类二百多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各有重点,但是都具有社会、经济、旅游、生态等多方位的价值,对于各类遗产,重点是要严格保护其本底价值、适度利用其直接应用价值尤其是注重综合性的利用,对于遗产地外部的周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间接衍生价值要大力发展,这样才能既保护遗产资源又促进遗产地整体社会经济发展,再反哺遗产资源的保护,实现遗产资源保护—遗产地整体发展的良性循环^[22-26]。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丰富、分布广泛,这里重点介绍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 8 项遗产的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间接衍生价值、艺术观赏价值和旅游延伸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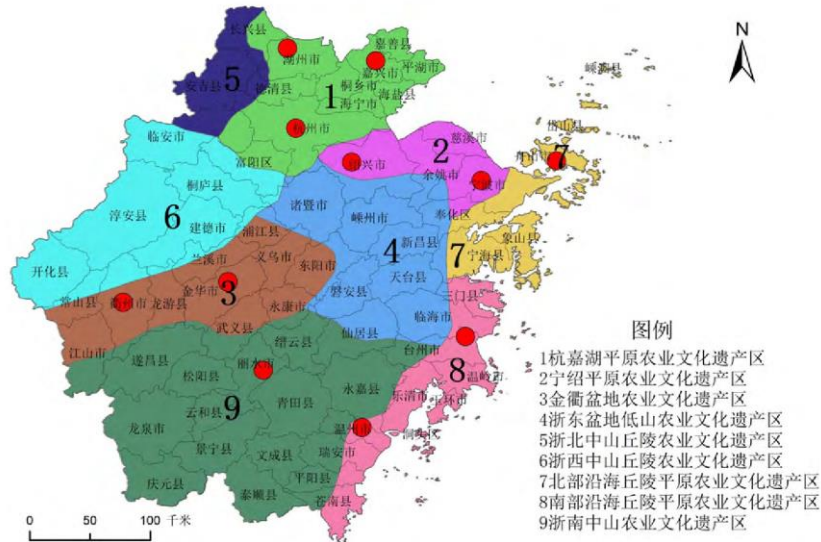


图 1 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区划图

源远流长、星罗棋布的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Tourist Attraction）价值评估体系和系统评价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有待后续深入研究。现对本文重点研究的 8 项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进行定量评价。根据已有研究的旅游资源价值评价方法^[22-23, 27-29]，在考虑浙江农业文化遗产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构建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价值的评价框架，重点研究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吸引力。

其中维度权重和指标层中的理性赋分均采用专家调查法，调查了长期在浙江省工作的文化类研究专家 24 人，旅游类研究专家 36 人，在文物局工作的专家 23 人，在文化和旅游局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人员 56 人，旅行社经理 28 人，旅行社导游 67 人，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213 份。

利用已有的客观数量指标和理性赋分指标对浙江省 8 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做综合评估，计算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在 10 个维度层的维度得分，再根据各维度的权重计算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总得分，结果是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旅游价值的总得分高于其他 5 项，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总得分最低。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不是很大，说明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差异不是很大，因其文化特色各有千秋，景观艺术美学价值各有特色，10 个维度各有特长，8 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均具有较大的发展旅游业的价值。

4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客源市场分析

4.1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客源市场潜力

因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吸引力比传统的旅游景区的吸引力弱，主要是吸引消费者前往休闲度假采购农产品等功能，所以这里选择 100km 范围作为吸引半径，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天驾车往返，称为“主体客源市场”。利用 ArcGIS10.4 对浙江省 8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做空间查询分析，统计 100km 范围内常住人口数量，作为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重点潜在的旅游客源市场规模。双休日制度下，基于计划住宿一晚、体验慢生活、休闲 2 天的旅游休闲需求，200km 出行半径也是可为旅游者接受的，称此范围为“总体客源市场”。

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客源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北部的 4 个处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杭嘉湖、宁绍地区，客源市

场范围内人口众多，“主体客源市场”均在 1800 万人以上，“总体客源市场”均在 8000 万人以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也明显高于南部的 4 个。南部的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均位于内陆山区，离大城市较远，客源市场人口少且收入较低，尤其是庆元县位于浙江和福建的交界山区，100km 范围内都没有地级市，客源市场狭小，旅游业发展潜力不大。

由增长极理论可知，分布于浙北地区的 4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和附近的著名旅游景区相互促进，形成了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供给增长极，因而旅游业发展成果突出。位于南部山区的 3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由于附近缺乏影响力大、高等级的旅游景区，例如此 3 县都没有国家 5A 级景区，缺乏强势的旅游供给增长极，因而旅游业发展相对较差。

再从旅游需求来看，北部的 4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100km 的主体客源市场范围内就有杭州、绍兴、嘉兴、湖州等特大城市，200km 的总体客源市场范围内更是再增加了上海、宁波、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等特大城市，这些特大城市都是旅游需求旺盛的旅游需求增长极。而位于南部山区的 3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离特大城市较远，尤其是庆元、云和。

南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主体客源市场和总体客源市场的人口总量远远小于北部的 4 个。而且南部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客源市场范围内只有温州、台州、金华、丽水等大城市，这些旅游需求增长极很显然比北部的旅游需求增长极势能要弱，旅游需求的拉力作用比北部弱得多。位于中间的仙居县域内有国家 5A 级景区——神仙居景区，旅游供给增长极和旅游需求增长极都表现出中等性状。

根据对浙江省内 8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和旅游客源市场人口以及客源市场范围内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定量分析，进一步表明旅游业发展和客源市场关系密切。旅游总收入和客源市场人口数、客源市场内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都在 0.75 以上，尤其是旅游总收入和客源市场内的居民收入的相关系数都在 0.9 以上，表明相关性非常强。旅游总收入和主体客源市场的相关系数大于总体客源市场的相关系数，这一定量分析结果与理论定性分析也是相符的，表明主体客源市场的重要性程度大于总体客源市场，也表明划分出主体客源市场和总体客源市场的重要性。

4.2 旅游需求增长极对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

对浙江省内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有较大影响的旅游需求增长极主要有省内的各地级以上城市以及附近的上海、苏州、南京等城市。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提供客源，其客源市场的提供效用是受各城市的城镇人口数量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居民的闲暇时间、居民的旅游偏好以及空间距离等因素影响的。

根据区域经济中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公式（公式 1）来计算^[30]，即任一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旅游效用与其本身的城镇人口和居民人均收入呈正相关，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呈负相关。区域中存在着众多的旅游需求增长极，所以要计算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其旅游效用的总和。

$$T_i = \sum_{j=1}^n \frac{P_j \cdot R_j}{D_{ij}^a} \quad (1)$$

由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区域内的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旅游效用明显大于区域外的旅游需求增长极，考虑到距离衰减规律，本文在计算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时只研究浙江省内的各地级以上城市以及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因其他城市即便纳入计算对总和的贡献也很小。式中： T_i 是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 i 的总效用； P_j 和 R_j 分别是区域中旅游需求增长极 j 的城镇人口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_{ij} 为农业文化遗产地 i 和旅游需求增长极城市 j 之间在现状交通条件下的最短交通时间； a 为距离摩擦系数，这里取 2。

以百度地图上 2020 年 2 月 24 日查询的驾车时间作为交通时间，研究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业发展的效用。其值随着指标选择的单位不同而不一样，但是相对意义是不变的，本文计算城镇人口用“万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万元”，距离用两地之间的驾车时间“小时”。

先计算出区域内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浙江省内 8 个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再计算总效用 T_i 显示各旅游需求增长极对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效用差别很大，距离越近、人口越多、收入越高则旅游需求效用越大。比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虽然属于丽水市辖范围，但是丽水对其的效用远远小于温州对其的效用；再如德清淡水珍珠系统位于杭州和湖州之间，杭州对其的旅游效用远远大于湖州对其的效用。

上海虽然距离稍远但是其能量足够大，所以效用也大，其对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旅游效用比绍兴本身还略大。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南京对 8 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效用都不是很大，其在总效用中所占比重介于 1.1%~3.4%，可见如果将其他的旅游需求增长极城市纳入计算对总效用的贡献也很小，所以本文计算浙江省内的 11 个城市以及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共 17 个城市已经基本上可以反映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总效用。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对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效用大于浙江省内的衢州、舟山、丽水的效用，所以浙江省各地积极融入长三角意义重大。计算结果是，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的旅游需求总效用是浙江省 8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中最高的，其次是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和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旅游需求总效用相比前面 3 个快速减少，其后依次是仙居杨梅栽培系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和梯田农业系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依次减少且减少速度非常迅速。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总效用差异很大，最大值约为最小值的 19 倍。将 8 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需求总效用值与各自 2018、2019 年旅游总收入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759 和 0.783，相关性都很强。

5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对策建议

5.1 积极利用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

区域旅游发展的源动力可以归纳为旅游供给增长极的推动作用和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境游需求旺盛的阶段，旅游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要充分发挥各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加强宣传促销，让各旅游需求增长极的人们全面了解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科学价值、美学价值、陶冶怡情价值、休闲养生价值等，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便捷性。

网络化时代传统的宣传促销方式仍然不可少，因为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要想引起消费者的关注仍然需要传统的促销方式，所以浙江各农业文化遗产地应该在重要的旅游需求增长极城市开展有效的宣传推介活动，可依据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效用不同采取差异化的宣传方式，以充分发挥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尤其是浙西南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由于主体客源市场狭小，更应加强在上海、苏州、杭州等旅游需求增长极城市的宣传促销。

5.2 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要和全域旅游理念相结合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知名度、旅游的美学价值、旅游科学价值等方面往往不如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在增长极理论研究中往往成为旅游供给增长极的影响腹地，很难单独成为强有力的旅游供给增长极。但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具有分布广泛、交通相对便利、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离居民点近等优势。

浙江省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人们的旅游经历相对丰富，很多满足观光、猎奇的旅游目的地多数已经游历过，而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正好可以全地域、全要素地满足人们日常休闲、度假的旅游需要。用全域旅游的理念指导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

源的开发，杜绝“单纯为旅游而建”，将满足旅游目的和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文化传承密切结合。

5.3 创新开发旅游供给增长极的旅游产品

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不是热点旅游景区，并且其旅游客源市场又相互重叠，所以创新开发旅游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是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旅游规划中应注意统筹兼顾，使农业文化遗产地和附近的热点旅游景区实现交通上无缝衔接，共同打造更强势的旅游供给增长极；旅行社在开发旅游线路时应注意将农业文化遗产地和热点旅游景区结合，设计出融汇农业文化遗产地附近各类旅游景区的旅游项目，如：西湖龙井茶文化系统和西湖景区的联合，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和庆元县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创造天然养生香菇文化旅游产品。积极利用附近的“网红”景点联合开发特色的“网红”旅游产品，也可以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地打造成“网红”景点。

5.4 规划好农民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的主体作用

当地农民应该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主体，要适度发挥外来公司在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开发中的价值，但是角色担当要把握好尺度，避免喧宾夺主。农业文化遗产根植于地方文化，传统居民、传统生活方式、传统价值观、传统物理要素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基础。但是农民发家致富、创造现代化生活的愿望也不能被忽视，所以各级政府要出面协调这些矛盾，宣传、引导、教育农民在创造现代化生活和保护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和合理的发展模式，让农业文化遗产在生产中保护、在传承中发扬、在创新中升华，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同时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参考文献:

- [1]Prentice R C.Tourism and Heritage Attractions[M].London:Routledge,1993.
- [2]Poria Y,Butler R,Airey D.The core of heritage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3,30(1):238-254.
- [3]喻学才,王健民.世界文化遗产定义的新界定[J].华中建筑,2008(1):20-21.
- [4]闵庆文,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J].资源科学,2009,31(6):914-918.
- [5]王思明,李明.江苏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 [6]李文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5,34(1):1-6.
- [7]何思源,丁陆彬,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4(11):34-38.
- [8]葛佩佩,张建国,蔡碧凡,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进展[J].农学学报,2016,6(11):95-100.
- [9]魏家星,姜卫兵,武涛.美丽乡村建设与农业遗产保护耦合发展研究[J].中国农史,2017(1):136-142.
- [10]文雅迪,张宇康,代亚男,等.苏南地区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开发风险评价研究——以无锡雪浪山茶园为例[J].江苏商论,2016(8):45-50.
- [11]罗治得,朱飞.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江苏兴化垛田为例[J].江苏商论,2018(3):48-50,55.

-
- [12]贺剑武. 广西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桂林龙胜龙脊梯田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19): 10300-10302.
- [13]于艳邱, 严艳. 基于保护视角的西北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新疆南疆绿洲农业系统为例[J]. 江西农业学报, 2010, 22(7): 210-211, 214.
- [14]汪本学, 张海天. 浙江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 [15]王莹, 许晓晓. 社区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子——基于杭州的调研[J]. 经济地理, 2015, 35(3): 203-208.
- [16]耿虹, 李彦群, 范在予. 农家乐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湖北、四川的比较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11): 183-193.
- [17]徐清. 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乡村旅游空间集聚研究——以浙江江山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3, 33(4): 174-178.
- [18]蔡碧凡, 陶卓民, 张建国, 等. 浙江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征与空间演化[J]. 经济地理, 2017, 37(5): 181-190.
- [19]杜群飞. 农业遗产保护和开发模式的探讨——以浙江省为例[J]. 生态经济: 学术版, 2012(1): 157-160.
- [20]熊友平. 湖州市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式旅游开发路径[J]. 湖北农业科学, 2018, 57(18): 141-144.
- [21]王斌, 闵庆文. 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浅议[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9, 4(11): 90-95.
- [22]孙业红, 成升魁, 钟林生, 等.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潜力评价——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J]. 资源科学, 2010, 32(6): 1026-1034.
- [23]王博杰, 何思源, 闵庆文, 等. 开发适宜性视角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评价框架——以浙江省庆元县为例[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0, 28(9): 1382-1396.
- [24]苏莹莹, 王英, 孙业红, 等. 农业文化遗产地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与饮食旅游偏好关系研究——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0, 28(9): 1414-1424.
- [25]王英, 孙业红, 苏莹莹, 等. 基于社区参与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资源研究——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5): 75-86.
- [26]陈耀华, 刘强.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及保护利用[J]. 地理研究, 2012, 31(6): 1111-1120.
- [27]保继刚, 陈苑仪, 马凌. 旅游资源及其评价过程与机制: 技术性评价到社会建构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556-1569.
- [28]黄震方, 祝晔, 袁林旺, 等. 休闲旅游资源的内涵、分类与评价——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9): 1543-1553.

[29]陆林. 旅游资源定量评价及其分级——以皖南地区为例[J]. 资源开发与保护, 1990(4):224-227.

[30]周玉翠, 邓祖涛, 郑晓云, 等. 长三角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可达性评价[J]. 经济地理, 2020, 40(2):217-226.